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天盛律令》研究

杜建录
波波娃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杜建录 波波娃 主编

《天盛律令》研究

杜建录
波波娃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盛律令》研究 / 杜建录, 波波娃主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2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ISBN 978 -7 -5325 -7416 -2

I . ①天… II . ①杜… ②波… III . ①法制史—中国
—西夏②《天盛律令》—研究 IV . ①D929. 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1630 号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书 名 《天盛律令》研究

作 者 杜建录 波波娃 主编

责任编辑 王 琪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 址: www. guji. com. cn

(2)E-mail: guji1@guji. com. cn

(3)易文网网址: www. ewen. co

印 刷 金坛古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2.5 字数 837,000

国际书号 ISBN 978 -7 -5325 -7416 -2/K · 1938

定 价 118.00 元

宁夏大学“提升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项目”资助出版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编委会

顾问：史金波 李范文 克恰诺夫

主编：杜建录 波波娃

编委：（以姓氏笔画排序）

孙伯君 孙继民 李华瑞 杨 浣 沈卫荣 佟建荣

林英津 荒川慎太郎 胡玉冰 段玉泉 聂鸿音

索罗宁 梁松涛 彭向前 韩小忙 景永时 薛正昌

总序

西夏在中国，大量的西夏文献收藏在俄罗斯，西夏研究成为中俄两国共同关注的学术领域。为此，2009年在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教育部）将“西夏文化研究”列入两国语言年活动项目，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和宁夏大学承担。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签订协议，成立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机制下研究机构——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教授任中方所长，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波波娃教授任俄方所长。

2010年7月26日，我利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银川学术年会间隙，专门考察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该院主持完成的《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说西夏》等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教育合作分委会主席，我高兴地看到，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每年都有新成果、新亮点。2010年10月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宁夏大学揭牌，2011年9月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揭牌。连续召开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一批西夏学中青年骨干赴俄罗斯访问研究。更令人欣慰的是，两国学者不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往来上，而是围绕西夏法律文献、社会文书、佛教典籍等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相继完成“西夏社会文书研究”、“夏译《孟子》研究”、“天盛律令研究”、“党项西夏碑刻研究”、“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释录”等课题，陆续出版的《西夏文献研究丛刊》和《黑水城出土汉文社会文书释录》，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源远流长，上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刊出西夏文专号，中苏等国西夏学者发表成果，相互酬唱，成为佳话；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学者联合整理出版大型文献丛书《俄藏黑水城文献》；进入新世纪，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框架下的西夏学合作研究，是在西夏文献整理出版基础上的深入研究，相信在两国政府的支持和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为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教育合作分委会中方主席
郝 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前 言

西夏在中国，大量的西夏文献收藏在俄罗斯，因此，西夏学是两国共同关注的学术话题。2009年4月，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国务委员刘延东的亲切关怀下，“西夏文化研究”被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教育部）确定为中俄“语言年”活动项目。按照项目要求，2010年6月2日，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签订“成立中俄（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协议”，两国西夏学合作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10年10月17日，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宁夏大学揭牌成立，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俄方所长波波娃，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中方所长杜建录共同揭牌。宁夏大学党委书记齐岳，校长何建国，著名学者史金波、陈育宁、克恰诺夫等出席揭牌仪式。2011年9月21日，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揭牌，宁夏大学校长何建国，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俄方所长波波娃共同揭牌。

在成立联合研究机构的同时，两国学者通过协商，围绕黑水城文献与西夏社会研究、俄藏西夏文献整理保护、俄罗斯西夏学论著汉译、中国西夏学论著俄译等领域，设计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研究课题，使两国新时期西夏学合作研究从协商讨论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2011年，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教育部）的指导下，制订了《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机制下研究机构——宁夏大学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中长期（2012—2020）规划》。按照该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有四：一是联合开展西夏文献与西夏社会研究；二是联合开展俄藏西夏文献的整理编目；三是联合开展俄藏黑水城西夏艺术品和实物资料数字化研究；四是互派访问学者，通过国家西部留学项目，带着课题到俄罗

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访问研究。目前已开展的合作研究有“西夏法律文献研究”、“中国藏黑水城汉文社会文书考证校勘”、“俄藏黑水城汉文社会文书考证校勘”等，项目成果将陆续在《西夏文献研究丛刊》、《黑水城出土汉文社会文书释录》中出版，《〈天盛律令〉研究》就是《西夏文献研究丛刊》之一种。

二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是西夏天盛年间颁行的一部法典，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版本^①，汉文本已失传，西夏文本1909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古城出土，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该法令共20卷，150门，1461条，没有注释和案例，全部是律令条文，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是研究西夏社会和中国法制史的重要资料。

1932年，苏联著名西夏学家聂历山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撰文介绍藏于亚洲博物馆（东方文献研究所前身）的西夏律令^②。1963年，戈尔芭乔娃和克恰诺夫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一书中^③，对《天盛律令》的卷次、页码，各编号的叶面尺寸、行数、字数、保存情况等作了描述。在文献整理的同时，克恰诺夫开始致力于进一步研究和资料的运用，1965年他发表的《有关西夏政府机构的西夏文史料》^④，就是对《天盛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门》的介绍和研究。1968年克恰诺夫出版的《西夏史纲》^⑤，也大量利用《天盛律令》中的资料。1987—1989年克恰诺夫相继出版四卷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⑥，第一卷为研究篇，是他对法典的研究成果，第二、三、四卷为法律条文的俄译本和西夏文影印件。该书刊布并翻译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识别出的《天盛律令》刻本，但缺少卷首《名略》及部分尚未释出的叶面。克恰诺夫倾注了二十年心血，第一次把西夏文《天盛律令》翻译成俄文，在西夏法律文献翻译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与译文一同刊布的影印件让更多的人见到了《天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律表”记载：“合汉文者奏副中兴府正汉大学院博士杨时中；译汉文者西京尹汉学士讹名□□；译汉文纂定律令者汉学士大都督府通判芭里居地；译汉文者番大学院博士磨勘司承旨学士苏悟力”，第108页。

② 《西夏语研究小史》，《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1932年。

③ 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1963年；汉译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1978年。

④ 《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69期，1965年。

⑤ 苏联科学出版社1968年。

⑥ 苏联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

盛律令》的原貌，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参照的底本。由于文本上的局限，克恰诺夫的俄译本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1988年宁夏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对克恰诺夫俄译本进行翻译，出版《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7章）》^①，遗憾的是只出版了前七章，后面的工作没能继续下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专家利用克恰诺夫的影印件直接汉译，完成汉译本《西夏天盛律令》，1994年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出版^②，从此中国读者能够看到这部法律的全貌。

1998年，《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八、九两册刊布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刻本和五种写本，另收录二卷名略以及刻本零叶和写本残件^③。史金波等先生据此对1994年出版的汉译本《西夏天盛律令》进行了五方面的修订：（一）补译了原来所缺的内容，包括卷首《天盛律令》名略二卷，卷十四《误伤杀与斗殴门》中新识别出的二十三条，以及少量刻本零叶和据写本新校补的残字；（二）删除了原汉译本中关于西夏字意的大量注释，仅在原件残缺或意义不明的地方出注；（三）参照当时西夏文献释读新成果改译了一些词语；（四）对一些句子的语序和标点进行了调整，以求译文顺畅；（五）将出现较多的法律术语和专有名词编成“译名对照表”，便于查阅^④。2000年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增订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

汉译本《天盛律令》开创了直接将西夏文法律文献译成汉文的先河，难能可贵的是，史金波等先生利用整理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便利，通过西夏文佛经发愿文、夏译汉籍、西夏文字辞书、类书、诗歌等文献中的资料，解决了大量西夏法律术语和名物制度的翻译，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汉文译本，而且为后来翻译西夏文《亥年新法》、《法则》等法律文献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解读西夏社会文书提供了重要依据，成为迄今通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

三

文献翻译、校勘、考证绝非易事，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翻译、考证又何尝

① [俄]克恰诺夫著、李仲三汉译、罗矛昆校：《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7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西夏天盛律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本，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等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八、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999年。

④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前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不是呢！正如俄译本作者克恰诺夫教授指出的：“这类典籍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一译而就，需要一代、两代、三代学者，对它们二次、三次甚至十次翻译，每次都要仔细推敲原文，才能使译文臻于完善。”^①汉译本《天盛律令》出版近20年来，随着新资料不断发现、公布和考释，对译本所依据原文进一步补充、推敲、考证成为可能。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工作是在原汉译本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也是受汉译本的启发^②。

（一）西夏文版本需进一步梳理。目前流行的西夏文本有克恰诺夫整理的影印件^③和《俄藏黑水城文献》甲种本。199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译本《西夏天盛律令》，完全依据克恰诺夫俄译本所依据的影印件，该影印件是对不同编号文本的缀合。2000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补译了原来所缺的内容，包括卷首《名略》二卷、卷十四《误伤杀与斗殴门》中新识别出的二十三条、以及少量刻本零叶和据写本新校补的残字。应该说以一种相对完整的文本为基础，补充该文本缺失而其他版本或复本里所存的叶面、字句，或其他文本墨迹相对清楚者，是一件非常艰辛的文献缀合工作。他为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完整的西夏文本，是功德无量的事。但从版本学的角度看，这种文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夏版本，特别是前述两次文本整理，均没有注明哪些条文是补缀的以及补缀文献的编号和版本情况，这样又给研究带来了一些不便，有的读者把它们误作一种版本使用。因此，版本梳理显得格外重要。这是其一。

其二，俄译本和汉译本均依据克恰诺夫整理的西夏文本，汉译者在第二版增订过程中，虽然对克氏整理的西夏文本进行了补充，但依然有不少问题，有的是缺漏，如卷十五《催缴租门》漏译第一、二行，即“畿畿畿畿畿畿畿畿畿畿畿畿畿畿畿畿”，意思是“京畿所辖七个郡县，根据土地的贫瘠程度，将地租的交纳数额分成几个等级，最优良土地的每亩纳租一斗，其次八升”。这两行正文和门类目录同在一面（俄藏甲种本39—1）。同时，因缀合失误，《催缴租门》还漏译了俄藏甲种本39—15右面半叶9行，从“租租租租租租租租”到“租租租租租租租租”，内容包括交租时间、催交地租和催促磨勘等。有的是页码顺序错乱，前述《催缴租门》第二行后的9行107字，即图版39—2右半叶空白部分，被错置在同

① [俄]克恰诺夫著、李仲三汉译、罗矛昆校：《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7章）序言，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页。

② 律令经常出现的一个职官，“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本从原字面译“言过处”，后来翻译者在俄藏西夏佛经发愿文中，看到这个词语汉文发愿文中的“提点”对译，由此在法律出版社本中一律改译“提点”。

③ 克恰诺夫俄译本附西夏文原件，苏联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

卷《春开渠事门》，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二部分漏译内容的前半段（俄藏甲种本 39—15）^①。

其三，《英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天盛律令》残件、《俄藏黑水城文献》混入其他法律文献的《天盛律令》残件，需要进一步考证校勘，有的可补《天盛律令》之缺失。如《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八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甲种本《名略》卷十一中间部分略有残缺，其中出工典门第三条标题缺失 3 字，且最后 2 字模糊不清；第六条标题缺失 2 字^②。《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八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乙种本中《名略》卷十一亦缺失。为此，汉译本该条名略缺译中间二字^③。而英藏编号 Or.12380—0044(K.KII0283.aaa)^④、Or.12380—0033(K.KII.0283.aaa)^⑤残件，恰好是《名略》卷十一，所存文字正好弥补俄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名略》卷十一第三条所缺，该行文字补全为“虧骸數瓶縗糞”，汉译“使役不许打杀”。

(二) 研究思路和方法需进一步梳理。西夏文字是一种死文字，西夏文《天盛律令》又是多种文本缀合，目前通行的汉译本除了上述缺漏、页码错乱等方面的问题外，在译文上还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如有的意译，有的是音译，使用者大多没有对照原文，考证原始本意，直接引用汉译本的资料，出现了一些以讹传讹或望文生义的现象；对部分难以理解的名物制度，还有必要利用西夏社会文书进一步考释；除了《唐律疏义》、《宋刑统》等法典外，缺乏和《庆元条法事类》等同时代法律文献比照研究。

四

针对上述问题，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整理研究确定为合作研究的重点，并获得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副总理级）秘书处的支持，分门别类考释研究，目前已开展的有农业、畜牧、内宫待命、

① 潘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催缴租门〉一段西夏文缀合》，《宁夏社会科学》2012 年 6 期，第 94—96 页。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等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八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名略》甲种本卷下（15—1 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第 15 页。

③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第 56 页。

④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第 19 页。

⑤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第 19—20 页。

司序行文、为僧道修寺庙、催索债利、边防、交通驿站等门类。具体做法如下：

（一）西夏文本对勘

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甲种本（刻本）为底本，和其他几种写本、克恰诺夫教授译本所据的刻本以及俄藏、英藏残件进行对勘，缀合、补充出比较完整的西夏文影印件和计算机录入文本。出校内容主要有四方面：（1）其他版本中的缺字、衍字、误字；（2）其他版本中行数、格式的不同；（3）叶面残缺、顺序颠倒；（4）根据其他版本和残件补充和缀合情况。

经过对勘、补充、缀合出的西夏文本，应是迄今最好的文本，一是参考目前能见到的所有西夏文《天盛律令》，内容比较完整；二是调整了原整理本错乱叶面；三是根据原始文献或影印件，注明克恰诺夫和史金波等先生缀合、补充情况，便于版本研究和史料运用。

（二）汉译本考证

以重新整理的西夏文文本为底本，对史金波等先生的汉译本进行考证、注释和补充。目前对西夏文《天盛律令》整理研究中，有的直接引用译文，有的重新意译，有的先直译，然后意译。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大都参考了汉译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意思与原译文基本一致，只是用词和表述有所区别，以及对个别错误作了修订。基于学术规范和尊重前贤的原则，不再另行翻译，只对其中的错误、遗漏进行修正补充，包括：（1）对专用术语、名物制度的音、形、义进行注释和考证；（2）和俄译本对勘，指出二者之间的异同；（3）订证译文中的佚、衍、误；（4）翻译汉译本的缺漏。

（三）利用相关文献考释

《天盛律令》中不少规定，单从字面上难以理解，如卷三《催索债利门》：“全国诸人放官私钱、粮食本者，一缗收利五钱以下，及一斛收利一斛以下等，依情愿使有利，不准比其增加。其本利相等仍不还，则应告于有司，当催促借债者使还。”^①西夏法律规定借贷粮食“一斛收利一斛以下”，不得超过 100%，即所谓的“倍称之息”，和同时代宋朝的借贷利息大体一致^②；借钱则“一缗收利五钱以下”，从字面来看，是 0.5% 的利息，是粮食借贷利息的二百分之一。长时期以来，对这条法律文献无法进一步阐释。直到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三件汉文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文契，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三《催索债利门》，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第 188 页。

② 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第八章《通货流通与高利借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249 页。

该文契俄藏编号分别为 7779A、7779B 和 7779E，均为西夏文佛经《种咒孔雀明王经》封套裱纸。7779A 被切割成大小略同的两块残片，残片结合部约缺半字，文契背面为收支钱账，存“每贯日生利口，每夜送壹贯”、“壹佰叁拾夜”等文字；7779B 文契有三块残片，存“天盛癸未十五年”等文字；7779E 存“貳拾文，限陆拾伍夜为满”等文字。

西夏贷粮按年、月、日计息^①，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文契则按夜计息，7779A 文契的偿还期限为 130 夜，7779E 文契偿还期限为 65 夜，是 7779A 偿还期限的一半。无论 130 夜还是 65 夜，都不是整月，利息只能按“夜”，也即“天”来计算，所谓“每贯日生利口口，每夜送一貫……”

遗憾的是“每贯日生利”后面一字被裁掉，另一字看不清，我们无法知道确切的日（夜）利率，但它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西夏借钱是按夜（天）计息的，前引《天盛律令》：“全国中诸人放官私钱、粮食本者，一缗收利五钱以下，及一斛收利一斛以下等，依情愿使有利，不准比其增加。”“一缗收利五钱以下”，当是一缗每日（夜）收利五钱，日利率 0.5%，月利率 15%，65 日（夜）利率 32.5%，130 日（夜）利率 65%。“一斛收利一斛以下”，应指全部利息。反映出法律规定粮食借贷以全部利息计算，货币借贷按每日（夜）利息计算。编号 7779 钱贷文契正好印证了法律上的规定。

《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在规定库藏物品损耗时，记录了二百多种中药名，这些名词大多是宋代西北汉语方言的西夏音译，1994 年版《西夏天盛律令》中，有近半数只是标音，没有翻译出药名，2009 年据存世的《政和证类本草》，重新翻译了《天盛律令》中的中药名，纠正了原译本里的错误七十余条^②。

《天盛律令》经常出现一个直译为“言过处”的官名，单从字面理解，很难翻译准确，后来在俄藏西夏文佛经发愿文中看到这个西夏名词和汉文“提点”对译，汉译者在修订中，一律将“言过处”改为“提点”^③。

杜建录 波波娃

① 史金波：《西夏粮食借贷契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一辑，2004 年，第 186—204 页；杜建录：《西夏高利贷初探》，《民族研究》1999 年 2 期，第 59—63 页。

② 聂鸿音：《西夏〈天盛律令〉里的中药名》，《中华文史论丛》2009 年 4 期，第 291—312 页。

③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前言，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第 6 页。

Предисловие

I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Западное Ся (Си Ся) было расположено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нынешнего Китая, при этом знач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 тангутских письмен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находится в России, поэтому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научной дисциплиной, в рамках которой обе страны развиваю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апреле 2009 г. при горячей поддержке вице-премьера Госсовета КНР, со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г-жи Лю Янь-дун, проек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ультуры тангутов» был включен Секретариато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программу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Год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Китае. В рамках этого проекта 2 июня 2010 г.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АН и Института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инся подписали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оздани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центров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Так начался новый этап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двух стран в области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17 октября 2010 г. директор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АН,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центра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И.Ф. Попова и директор Института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инс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центра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Ду Цзянь-лу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 открыл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Нинся. На церемонии открытия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и ректор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инся Хэ Цзянь-го, 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ий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инся Ци Юэ, известные ученые Ши Цзинь-бо, Чэн Юй-нин, Е.И. Кычанов и др.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е откры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центра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в Институте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АН ректор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инся Хэ Цзянь-го и

директором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АН И.Ф. Поповой состоялось 21 сентября 2011 г.

Пр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вместных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центров ученые обеих стран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определили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и хранению тангутских письмен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ллекции, переводу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труд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тангутоведов, переводу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трудов китайских тангутоведов и пр.,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ли целый ряд научных тем. Так были заложены основы для конкрет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на новом этапе.

В 2011 г.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был утвержден «Среднесрочный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2012-2020) план работы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го центра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инся как структуры, созданной для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рограммы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сфере».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этим пла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должно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по следующим четырем основ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1. Изучение тангут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2. Каталогизация тангут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хранящихся в России; 3. Оцифровка хранящихся в Росс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искусства 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4. Обмен приглашенными учены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дл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научных тем в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АН в рамках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стажировок за рубежом для научных кадров Западного Кита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уже совместно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науч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следующим темам: «Изследование памятников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рава»,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изд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хся в Китае»,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изд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хся в России» и др. Результаты проекта будут опубликованы в продолжающихся изданиях: сериях «Изследования тангутских письмен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и «Документы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з Хара-Хото». Настоящий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изучению «Измененного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енного Кодекса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 в серии «Изследования

тангутских письмен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II

«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далее - Кодекс) был обнародован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Си Ся в указанный период на тангутском и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ах^①. Китайский текст был утрачен, тексты на тангутском языке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в 1909 г.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Монголии (Китай) в аймаке Эдзина, в древнем городе Хара-Хото, и сейчас они хранятся в Институте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АН. Тангутски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включает 20 глав, 150 разделов, 1461 статью, не имеет комментариев и толкований прецедентов, целиком состоит из текстов законов,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уголовному,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му,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му, гражданскому,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му и военному праву. Кодекс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и Ся 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права.

В 1932 г. известный советский ученый Н.А. Невский в «Специальном выпуске, посвященном тангутскому языку» «Бюллетеня Пекин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опубликовал статью, в которой были вперв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рав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Кодекс),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Азиатском музее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АН)^②. В 1963 г. З.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И. Кычанов в

① См. Ши Цзинь-бо 史金波, Не Хун-инь 聂鸿音, Бай Бинь 白浜. Тянь-шэн нянь гай цзю дин синь люйлин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 «Список составителей кодекса»: «Сверщик китай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помощник докладывающих государю, наблюдатель-наставник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столичного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наставник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китайск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Ян Би-чжун; переводчик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 Западной столицы, магистр китайск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переводчик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кодекса, магистр китайск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начальник охраны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а Пхалие Киуцу; переводчик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ставник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тангутск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передающий приказы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ревизии и контроля, магистр Сучжилие», с. 108.

② Си Ся юй яньцзюо сяоши 西夏语研究小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 // Голи Бэйтин тушугуань гуанькань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Бюллетен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екинск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и Ся вэнь чжусань хао 西夏文专号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посвященный тангут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1932, cc. 389-403.